

首席谈艺

文学史的边角料，西方编辑们的故事

柳青

看多了出版界的“往事并不如烟”，感受反而不是公众号里泛泛而谈的“在10万+的年代，编辑何为”。恰恰相反，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把文学价值变成商业价值，出版业的这些“真相”从未改变过。

电影《天才捕手》里有个细节，沃尔夫冒犯菲茨杰拉德，他俩共同的编辑——珀金斯训了沃尔夫，他说：“如果哪一天你能看到他人眼里的痛苦，届时你也许能写出超越菲茨杰拉德的文字。”以编辑的身份看到这种细节，挺尴尬的，太假了。也许导演认为，这构成一个有戏有情有冲突的段落，可坏就坏在戏做得太足。

“过了头的戏”在《天才捕手》里不是一两处，于是电影错失《天才的编辑》这本传记真正的灵韵。从《天才的编辑》到《天才捕手》，“怎么写小说、改小说”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电影的重点，“戏”在人身上，在编辑和作者一言难尽的关系里。面对“人与人之谜”这个最迷人的戏剧悬念，虚构在现实面前露出了孱弱的一面。《天才捕手》的结尾特别煽情，珀金斯在沃尔夫死后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绝笔信结束于“那一天我们登上高楼，感受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荣耀和力量。”珀金斯摘下帽子，独自躲在办公室里抹眼泪。而现实中，沃尔夫写信时确实病重，但珀金斯收到信后还是回了，大意是“旧时光和故地都不必回了”。如果要逐一对比

虚构和现实的细节偏差，没太大意义，只是电影用相爱相杀的套路去“解释”两人之间从默契到分崩的逆转，既虚张声势也太随意了。

当然，还是要感谢电影，如果没有这些虽然演得不着调但盛名在外的好莱坞大牌演员，“编辑们的故事”真是寂寞的题材。珀金斯作为发掘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沃尔夫的文学编辑，在美国文学出版界曾是家长式的存在，他的传记《天才的编辑》早在1987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只卖了不到2000册。几年前，《我与兰登书屋》《出版人》《加斯东·伽利玛》等出版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陆续出版，也是读者寥寥。我是个趣味不够高级的读者，读编辑们的故事，对高大上的文学判词没留意，惦记的大半是编辑和作者相处的“老娘舅”琐事。编辑和作家的组合，有情有才，相逢于微末时，都想驶得万年船，像对待生死一样对待文学。可是面对评论、声名和金钱的惊涛骇浪，以及作品无常偶然的命运，编辑和作家的“情谊”又实在脆弱，文化人身体矜贵，不等于他们不计较。

沃尔夫凭着《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在美国文坛站稳了脚，

比起前两部大部头，他和珀金斯合作的第三本书是中短篇合集，珀金斯就和出版社商量，把沃尔夫的版税从15%调低到10%，沃尔夫为此大闹，最后争回了15%的版税，至此，两人已经有裂痕的关系遭到重创。把《时间与河流》献给珀金斯的，是沃尔夫，揶揄珀金斯是“讨价还价中从不吃亏的狐狸”，也是沃尔夫。

布克奖的创办人麦齐勒在回忆录里也写了一段，他和《裸猿》的作者戴斯蒙·莫里斯情投意合时，两人一起去马耳他度假，后来莫里斯转投别家出版社，一拍两散，从此路人。麦齐勒感叹出版界的人际关系脆弱，反复上演着编辑们的苦情戏：“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所以，青史留名的作品是一回事，作品背后的私怨纠葛往往是另一番场面。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娘西尔维亚·毕奇客串过一次文学编辑，给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一生只做这一本，10年里重印了11次，卖到洛阳纸贵。然而《尤利西斯》在美国一解禁，乔伊斯就和兰登书屋签约，强硬地要求毕奇放弃版权。毕奇的回忆录

原稿里有几段委屈诉苦的文字：“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乐趣是我的，而利润都是他的。……我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他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手腕强硬。”她甚至在给姐姐的信里写道：“他可以把别人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

看多了出版界的“往事并不如烟”，感受反而不是公众号里泛泛而谈的“在10万+的年代，编辑何为”。恰恰相反，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把文学价值变成商业价值，出版业的这些“真相”从未改变过。历来文场如战场，寸土必争，从前的编辑同样和大众博弈，和评论斡旋，同样承受着现实销售数据的压力作出艰难抉择。

伽利玛以94岁高龄辞世，他在半个世纪里选择的作者群，筑起法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但他以出版大量快餐式畅销书为代价，培养出“七星文库”。麦齐勒做了40年出版，公认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他却强调：“你永远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做这行，运气很重要。”当年他签下马尔克斯5本书的版权，前4本赔得血本无

归，直到马尔克斯交出第5本书——《百年孤独》。珀金斯在美国出版界地位卓然，但他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承受的金钱和舆论压力，也不是寻常编辑能忍受，毕竟，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出版社库房里还积压着几千册没卖出去的《盖茨比》，两个当事人都过世多年后，菲茨杰拉德才被迟到的地追认为20世纪最了不起的美国作家。

美国文坛的另一位“掌门”编辑戈特利伯在85岁高寿上，出了回忆录《嗜读之人》，他说做一辈子出版，悟到的就是“出版的本质是你自己的‘一头热’”。这是一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役。戈特利伯掏心掏肺地写，做编辑，要紧的是对作品有同理心。可也是这个作者们公认“最善感、最敏锐”的读者，为老不尊，一把年纪抖落让太多名家难堪的细节，为人作文都不太地道，欠缺同理心得很。

有时想想，翻检文学史的乐趣也就在此，比照这些人在写作中通达悲悯，一转身投入现实七情六欲的镣铐必较，人性的枷锁里，锁着最丰富的戏剧。

杜庆春

《刺客信条》拍成了『跑酷』 坠落在历史的窠臼中

从一种现实接入另一种“现实”，这是游戏类题材的卖点，但这未必是电影成败的关键。

如果我们不能在一部强调视觉体验的电影里看到“惊奇”的体验，无法拒绝现实的地心引力，那么这部电影就是被保守扼杀了。

《刺客信条》这个游戏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对同名电影最初的期待是因为刺客故事和“跑酷”这个挺帅的概念相结合。

然而这部游戏领域的大IP电影最终在中国市场非常低迷的票房表现，让我的观影期待成为另一种验证活动：同样是游戏衍生的电影，对照《生化危机：终章》制造的观影狂欢，为什么《刺客信条》搁浅了？

一种信仰要消灭掉人类选择其他信仰的自由，中国观众面对这个主题可能感到陌生，而在西方文化内部，这是看似自省、实则表彰自我传统。这个电影的叙事，是从所谓的前世以及时髦的“穿越”角度，讲一个英雄改变历史的老套故事。《刺客信条》的主题和叙事策略都是“旧”的，但这些并不是造成整部电影看起来非常守旧的根本原因。

一部改编自游戏的电影，它的创造力可以体现在用什么样的视觉方法呈现人物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在《刺客信条》里，那架把主角从当下带往过去的机器是有新意的，但这仅有的一点新意，不能满足观众的期待。

从一种现实接入另一种“现实”，这是游戏类题材的卖点，但不认为这是电影成败的关键。游戏里的强调参与感的过关模式未尝不能找到相对应的戏剧模型，但这种对应无法保证故事能在观众心理层面制造代入和激励。比如《刺客信条》，确立了一个严谨的戏剧结构，但并没有发掘“人”的戏剧性，也没有在“人和人关系”中构建真正的悬念，而“人与人之谜”才是一切戏剧中最伟大的悬念，也是戏剧制造超越游戏的“代入感”的秘密所在。

但《刺客信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在“美学”的层面大保守了，它陷在陈旧的视听体系里。

“跑酷”这项运动本来是解构空间现实性的，让空间的属性发生游戏性的颠覆，这也是这个行为的魅力所在。在《刺客信条》中，“跑酷”风的动作设计被实在的“历史感”消解了，西班牙古典城市建筑群、基督教和摩尔人的古装场面、类似史诗片中的马车追逐，这一切制造的质感感，让“跑酷”的行为坠落到“现实”的窠臼里，想象力的翅膀折了。如果我们不能在一部强调视觉体验的电影里看到“惊奇”的体验，无法拒绝现实的地心引力，那么这部电影就是被保守扼杀了。

在这个意义上，《刺客信条》是一部古典电影，动作场面和镜头组织都严谨地遵守既有的秩序，这使得它成为一种保守信条。于是，在“英雄拯救世界”的陈词滥调里，“刺客”作为一个“陌生”或者“奇观”的角色，没有了挑衅的色彩，丧失了它原本的吸引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借助中国文化传统，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的伤痕，在华裔作家笔下——

中国是一个永远的镜像，以便打量美国

钱佳楠

近来，随着张翎新作《劳燕》发表、戴小华新作《忽如归》出版，海外华裔写作者成为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汤亭亭的名字虽然逾越了“华裔”的标签，跻身英美文学当代大家行列，但她也可能是华裔作家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位。

本文提示我们换个视角看待她的写作：在那个矛盾尖锐的文化战场上，她尝试打破一些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试图借助孔子的遗产，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的伤痕。

——编者

汤亭亭的名字在美国逾越了华裔作家的狭隘标签，已进入美国文学的经典，当美国高校教师推荐必须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家时，汤亭亭和爱丽丝·门罗、菲利普·罗斯、塞林格、托尼·莫里森等一并在列。然而，自汤亭亭于1976年出版《女勇士》起，有关她作品的争议就鲜少终止过。

中国读者也许只读一读内容概要，就可能仓促作结：《女勇士》是在贩卖中国的“奇观”。全书首章《没有名字的女人》写因出轨而被乡人逼迫、投井死去的姑姑，第二章则是叙事者“我”为帮姑姑报仇，赴白虎山学艺，最终发现不过是南柯一梦，之后的章节转到美国，辛苦操持洗衣店的华裔移民，来加州寻夫却最终发疯的小姨等等，如今都仿佛沦为充斥着成见的中国移民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汤亭亭遭遇了之后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遭遇过的质询：你通过渲染“异国情调”，把母国的文化变作西方的傀儡。

有关汤亭亭争议的最高点发生在一次公开座谈中，同样有着亚裔身份的剧作家、批评家赵健秀指责汤亭亭篡改花木兰的故事。《女勇士》的第二章《白虎山学艺》很大程度上是花木兰故事的改写，叙事者是个7岁的小女孩，借由仙鸟的殷勤探看，结识一对武艺非凡的老夫妇，老夫妇对她说：“你能忍受跟随我们生活15年吗？我们可以训练你成为真正的女勇士！”叙事者选择留下，未给双亲捎只言片语，实在思念家人时只能借助一瓢葫芦窥得双亲的相貌，15年后，她出落成武林高手，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率领一班军队将侵略家乡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事成后退回女装，嫁

人生子，深藏功与名。令赵健秀尤其不满的是，故事中汤亭亭将岳母刺字的情节嫁接到花木兰的故事上，15年后，叙事者回到家乡，决定替父征战的前夜，她的父亲在她背上刻下“复仇”字样，他解释说：倘若你死了，暴尸荒野，人们也可以在你的尸体上看到你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赵健秀认定这是在虚假表现中国文化。多年后，面对谭恩美因《喜福会》走红，赵健秀也把类似的苛责投向谭恩美——你笔下的中国是虚假的。

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艾米·亨格福德在《1945年后的美国文学》课堂里专就这一批评作出回应：“这就好比有人对后现代作家约翰·巴恩斯说，‘等等，你篡改了奥德赛的故事！你在作伪！’在对文学传统采取捍卫态度的读者眼中，传统的“真实”和“纯粹”都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改写即玷污，这或许也是不少中国读者翻开海外华裔文学时连连摇头的原因，他们会叹息：一派胡言。

且不论传统是否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后世的改写与诠释不断丰富其内涵，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看待美国华裔作家，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中国的传统，而是美国的主流文化。

汤亭亭曾经很明确地表示：“和所有美国作家一样，我的志愿是写一部能够进入美国主流文化视野的长篇小说。”所谓的美国主流文化视野，长期由白人男性掌控着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作为华裔作家开篇之作的《女勇士》恰恰是试图创造“原型”，而非固化既有的写作类型。

《女勇士》非常强调话语的重要性，全书交织着两个叙事声音，一是叙事者，二是叙事者的母亲，后者对前者强调：“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故事，你不许告诉其他人。”母亲所讲的就是姑姑投井的故事，她说：“我们说你爸爸只有兄弟，没有姊妹，仿佛让家族蒙羞的她从未来到这世上一般。”可见，《女勇士》的叙事是力图打破禁忌的“话语”，当叙事者选择言说，通过“讲述”，在“话语”中，她重新赋予姑姑生命，让其存在。类似的，在《白虎山学艺》中，故事开场，母亲讲述的就是两百多年前鹤拳的创始人，以及花木兰。这个故事中叙事者的声音不是打破禁忌，而是追随这些传说开启幻想，让自己在梦境中复制这些女勇士的人生履历。汤亭亭对自己的写作有这样的期许——运用想象创造“真实”。这些勇于言说的中国女性形象对中国读者而言稀松平常，但在1970年代的美国却是晴天霹雳。因在那之前，美国文学视野中的华裔女性类型不外乎两种，一是温柔寡言的瓷娃娃，二是心怀叵测的蛇蝎美人，“花木兰”是她为华裔女性正名的“原型”，而非类型。汤亭亭迫切反击的是美国白人男性营造的狭隘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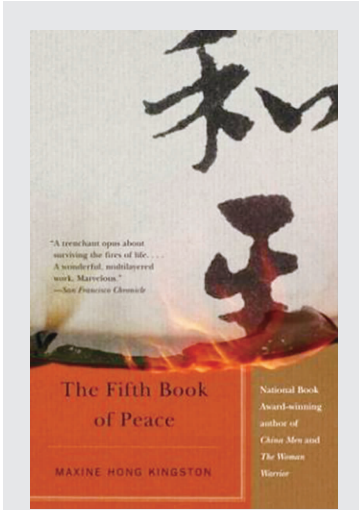
又如，汤亭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表面看是运用西游记的故事模版，但实际挑战着美国清教徒长期把持的话语权。她在一次访谈中谈道：“我想让华裔美国人也有一个充分的踏足这片土地的理由。清教徒总说他们来到这里追求自由，然后我就在想，在主流视野中什么是华裔最初来美国的理由？很

遗憾，是为了金矿。”这个刻板印象影响深远，时至今日，美国主流社会仍有人将华裔以及华人视作“过来赚大钱”的类型。于是，汤亭亭决定要给华裔重新寻找一个理由，幸运的是，她在故纸堆中找到，最早一批在旧金山上岸的华裔移民是一百人左右的皮影戏剧团，“他们在世界各地行走——传递孙行者的精神”。当时采访者提醒她，这种孙行者精神迥异于清教徒的苦行传统，汤亭亭回应：“现在在我们交融在一起了——苦行的和世俗的，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的美国文化会发生什么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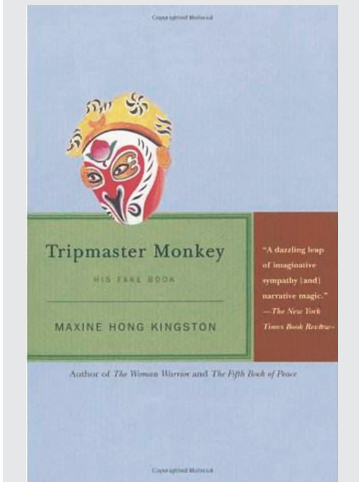
后来，当汤亭亭诠释孔子时，她的立场是孔子对于疗补美国主流文化何以可能。美国的文化历史充斥着暴力冲突，汤亭亭曾有一兄弟失踪于越南战场，这段私人经历更让汤亭亭在一个矛盾尖锐的文化场域中，时刻思索非暴力的和平路径。她认为孔子给予她启示：孔子降临于乱世，但他重建秩序、社群、和平以及和谐。他用非暴力的方式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和睦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在《第五和平书》中，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为她提供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疮疤的新视角。

中国学者研究海外华裔文学时常会感慨，中国形象被扭曲，中华文明遭误解，西方人眼中没有真实的中国。但诚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中国）永远不会客观地存在，它只是在我们的诸多解释方式当中的一个游移的参照点。”对美国华裔作家而言，中国将是一个永远的镜像，以便打量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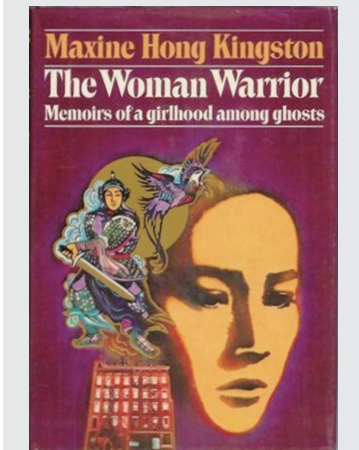
(作者为青年作家)



《第五和平书》中，中国文化传统为作者提供思考美国主流文化疮疤的新视角。



《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在美国背景下，对西游记故事的改写。



《女勇士》的叙事者追随传说开启幻想，让自己在梦境中复制那些女勇士的履历。

汤亭亭对自己的写作有这样的期许——运用想象创造“真实”。一个勇于言说的中国女性形象对中国读者而言稀松平常，但在地阔入美国主流文坛时，却制造了晴天霹雳。在那之前，美国文学视野中的华裔女性或者是温柔寡言的瓷娃娃，或者是心怀叵测的蛇蝎美人。“花木兰”是汤亭亭为华裔女性正名的“原型”，她以此迫切反击美国白人男性营造的狭隘传统。

图为动画电影《花木兰》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

